

# 略谈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研究中的资料积累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牙含章

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历史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所含一定的历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调查研究,无疑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我国对于地方志的编纂独具传统,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在世界上可以说无与伦比,是我国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但过去地方志书的内容偏重于记述汉族的情况。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或则无志,或则所录不详,而且存在着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影响。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为加强少数民族志书的编纂工作,召开这次会议,讨论修志的指导思想、篇目、体例和工作开展问题,这无疑将会改变历史上志书修纂忽略少数民族的不平衡状况,使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地方优势、历史贡献,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等等都能得到充分的记载,成为我国新编地方志这套宏伟“百科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编少数民族地方志书的编纂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我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少数民族地区即占60%强。在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台湾省外截至现在,已建立有五个民族自治区、三十一个民族自治州,八十一个民族自治县(旗)。由于历史上多次民族迁徙、屯田、移民成边、朝代更迭等原因而引起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民族分布,形成了各民族又杂居、又聚居互相交错居住的状况。有些少数民族既有一块或几块聚居区,又散居在全国各地。大约有一千万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在全国各省、市的大小城镇和乡村。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不仅相互影响,而且都和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和现状。因此新编地方志书,要照顾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大家庭的特点,把聚居的和散居的少数民族的情况,一无遗漏地、正确地反映出来。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包括民族学的调查研究是与地方志的积累资料和调查研究工作相通的。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地方志的资料工作、民族研究、民族学的资料工作,都要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采访。对调查资料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核实鉴定之后提供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作参考的依据。一个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这对于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都是有着现实的、深远的意义的。

由于地方志的资料积累工作与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具有共同的性质,作为一个民族研究工作者,要向地方志的工作者学习,因此我们把解放后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做

一个汇报，以资交流，以求教正。这个发言没有经过充分讨论，错误在所难免，请指正。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部分。随着民族工作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就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和国家为了彻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毛主席的“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名言，都深刻地说明各项工作需要调查研究，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更迫切的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解放前，国民党对我国少数民族采用的是压迫和歧视的政策，对少数民族是不承认的。所以从解放初期起，为了贯彻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特别是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识别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民族成分，以便帮助他们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挥各民族人民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

民族识别工作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的。在工作中充分地照顾到各民族的特点和各民族的意愿，几年前在调查研究中识别民族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迨至现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国已正式确定的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比原来人们知道的增加了好多倍。包括民族识别工作在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也获得了显著成绩。例如解放初期在社会性质和汉族社会性质大体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调查研究工作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是极为关心的。1956年，党提出了必须及时地、迅速地、完成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任务。当时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各民族的面貌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必须不误时机地、广泛而地开展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才能尽快地、更好地把少数民族旧的社会情况和存在的历史资料搜集起来。无疑这是宝贵的丰富的资料。在大变革的年代，怎样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整理出来，传诸后代，丰富祖国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宝库呢？

1956年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由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要在四年到七年内基本弄清各少数民族在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形态和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材料。调查的方针是：首先调查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状况，然后尽可能地搜集历史资料 and 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风俗习惯等。在蒙古、藏、维吾尔、僮、傣、彝、黎、景颇、卡瓦、鄂伦春等二十个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

我国少数民族，在解放前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在解放以来历次调查基础上，对我国有五千六百万人口的五十个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的结论，截至解放时为止，大部分少数民族接近于或者基本接近于汉族的发展水平（个别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汉族的发展水平）。有四百多万人口的藏族、傣族、哈尼等民族地区还保存着封建农奴制度。约一百万人口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还停留在奴隶制阶段。另外还有景颇、傈僳、独龙、怒、布朗、瓦、基诺、鄂伦春、鄂温克、珞巴和部分黎族等十多个

少数民族（全部或者一部分），共约七十多万人口，还保留着更为原始的面貌，尚未完全进入阶级社会。

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就是根据各个民族的发展特点而决定的。例如对于那些原始公社残余比较浓厚，阶级分化虽已开始，但还不很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和国家采取大力帮助发展生产，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经过必要的社会改革，建立合作社，并实现人民公社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对那些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少数民族，党和国家首先领导这些民族的劳动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然后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1958年5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少数民族研究组，加强了对民族研究工作的领导。在同年6月23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对过去两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做了检查和总结，肯定了成绩。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制定出在今后一年内民族研究工作的跃进规划。目标是一年内完成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五十个民族的简史、简志，加上由地方编写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称为三种民族问题丛书，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这样庞大而艰巨的任务，动员了中央与地方的有关机关、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学生数百人，除了扩大原来的八个调查组以外，又增设了青海、甘肃、宁夏、湖南、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八个调查组。各调查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人。这种包括专业研究人员、高等院校的有关师生、地方工作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调查队伍，在十六个省区的广大国土上，所进行的普遍的调查研究工作，其规模之大，在中外历史上，应该说都是空前的。

调查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已经整理出的调查资料共有一百九十一种，一千四百多万字；整理完毕尚未付印的调查资料有一百五十四种，一千五百多万字。整理付印的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三十二种，七百五十多万字。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写并印出了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五十七部。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电影艺术手段，根据调查材料的科学论证，系统地记录和复现了我国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提供了形象化的科学材料。从1957年开始摄制以来，已经完成二十一部影片。大部分影片在一定范围内放映后，曾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得到观众和学术界的好评。这些影片尽管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仍然是研究人类社会极为难得的资料。

与此同时，搜集了一定数量的民族文物。这些影片和文物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总之，从1956年到1962年以及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所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成绩斐然。在工作中尽管没有完成三套丛书的出版任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而贡献还是不小的，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

事实证明我们以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状况为重点的调查方针是正确的。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

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说:“人们的生活从远古以来即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正是坚持了以经济基础为重点的调查方针,我们把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一个一个地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另一方面,我们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在调查组的影响时,对那种不要经济基础,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猎奇取异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这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前人的东西,对待旧的东西是要有分析、有批判的。我们认为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既不能一律信从,奉为圭臬,也不宜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批判地而又审慎地吸取其有益的部分。也就是说贯串在他们调查中的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政治目的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偏见,我们是要批判的,而他们在调查中集累的事实材料、某些经验,取得的某些成果,则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任何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由于大跃进的总的形势,我们对资产阶级民族学、社会学的批判,是受到了“左”的干扰的。致使一部分同志,不愿接触上层建筑的调查,或者这方面的调查多了一点,婚姻家庭、风俗习惯的调查多了一点,就心有余悸,怕犯错误,怕受批判。因此在整个调查材料中,上层建筑的材料比较少,留下的空白比较多。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民族学、社会学,干脆取缔,贬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使人们对许多调查项目,望之生畏,不敢着手进行。

十年浩劫给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所造成的极大损失,是难以弥补的,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有的改行转业了。尚未整理的调查资料,许多散失了。个人积累的不少调查研究资料也散失了。特别是在大变革、大动乱的年代,许多原来的东西,倏忽即逝。加上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历经沧桑的老人,历史的见证人,由于自然法则和十年浩劫的摧残已离开了人世,许多情况,年轻的一代知道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再去西藏作调查时,和三十多岁的人谈起来,什么是农奴、什么是溪卡(庄园),他们都恍若隔世。在1959年3月平息西藏叛乱时,他们只是八、九岁、十多岁的孩子,农奴制度是个什么样子,怎么说得清楚呢?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迫切性、抢救性,至今仍是突出的,并非危言耸听,不能再漠视了。

在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中所集累的经验是丰富的。首先是贯彻了党的领导。由于有党的领导,才有可能出现由党和政府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师生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工作才有可能在参加与配合当地的中心工作中进行,从而获致广泛的、比较翔实材料。

从调查方法说:正是按毛主席说的“向社会作调查”的方法,即深入到各民族群众中,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去做实地调查研究。着重从现状出发,调查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而后追溯他们的族源,研究他们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同时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和其它有关学科的资料,以补充现状调查的不足。再如在调查中采取点面结合,调查与研究相结合,现状调查与历史追溯相结合等等方法的经验,都是值得肯定发扬的。

但是不论是点的或面的调查,综合的还是专题调查,下去之前都要作好准备工作。首先要明确调查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搜集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口头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份

比较详尽的调查提纲。提纲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在调查中还可以修订或增减。只要根据各人所长进行适当的专题分工，在调查中互相协作补充，就会获得较好的成果。如果不重视搜集和熟悉已有的材料，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提纲，调查人员下去以后，茫茫然漫天撒网，那就会费时甚多，所得甚少，甚至无从掌握确切的材料。

有提纲，又要不被提纲所困。要从实际出发，发现什么问题，调查什么问题，举一反三，根据对象所熟悉的东西提问弄清楚问题。找个别人谈，或找两个人一起谈，或三、五人，六、七人开座谈会，对象都要经过选择，按问题的需要穿插进行。一般是几个人在一起的座谈会为好。

当天调查的材料，最好当天用大卡片的形式整理出来，这样就不会遗漏，容易发现问题，及时查对补充。事实证明，大卡片的方法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一件事情写一张大卡片或两张大卡片，不打草稿，就可以收放起来，过一个阶段，归一下类，整理材料时就比较方便，可以说事半功倍。这对调查者说是不太辛苦的。切忌把调查笔记放几周，几个月，甚至成年累月，才去整理材料，那就要翻天书了，吃这种亏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

对一个调查工作者的要求是比较多的。如懂得一种民族语言，有一点语言学知识，有一点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知识，有一点地理学、动植物学知识，有一点文学艺术素养，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素养，对我们的调查研究都是有裨益的。因为在与群众的调查生活中，几乎每一天都会碰到新颖有趣的现象和问题。在这些广阔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面前，总要求自己作出答案。书到用时方恨少，实地调查需要逼着我们学着干，干着学。如果那一方面的知识薄弱，在那里就会留下空隙。

这些肤浅的体会，集中到一点，对一个参加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必须和基本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在民主改革中，在对敌斗争中，在餐风露宿的生活中，许多参加过调查的同志是有深刻体会的。你没有取得群众的信任，你没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这个调查，很难说是符合实际的。历史上大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民族隔阂，没有完全消除之前，对于一个外族的陌生人，人家愿意吐心里话吗？不行的。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才能做到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不迷离方向。在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中，特别是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为我们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指针，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个发言，是我们在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期间的一些认识和体会，认识很不全面、很不深入，加上不是集思广益讨论出来的东西，所以片面性，甚至错误都是难免的。这里还有曾经参加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前辈和同志，特别是有搞地方志多年经验丰富的同志，请给予批评指正。